

陇上学人文存

赵逵夫 卷

赵逵夫 著

韩高年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赵逵夫卷 / 范鹏总主编; 赵逵夫著;
韩高年编选.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26-03931-1

I. ①陇… II. ①范… ②赵… ③韩…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人文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1726号

责任编辑: 马海亮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赵逵夫卷

范 鹏 总主编

赵逵夫 著 韩高年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2.125 插页7 字数326千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3931-1

定价: 48.00元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



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

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赵逵夫，男，汉族，1942年生，甘肃西和人。研究生学历，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遗产》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辞赋学会顾问；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曾先后担任甘肃省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赵逵夫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与古典文献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先秦文学与文化、诗赋研究上造诣深厚、影响巨大；其楚辞学研究更是成就卓著。同时，他还在西北地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

赵逵夫教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屈原探幽》、《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主编兼主要作者）等专著；主编《诗赋研究丛书》（已出版20



种),担任大型丛书《诗经研究集成》和全国性学会的《诗经研究丛刊》、《中国楚辞学》(丛刊)的编委;为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先秦卷)主编兼主要作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先秦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该成果在2005年1月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的评审中被评为优秀项目(为甘肃省首个被评为优秀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6年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主持完成《先秦文论全编要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完成《全先秦文》项目,被列入《“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总主编《历代赋评注》(包括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卷、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七部,共420万字),201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

赵逵夫先生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和他独特的成长环境、个人的勤奋努力密不可分。

赵先生出生于一个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家中藏书多,父亲淹博文史,擅诗能文。良好的家庭氛围使赵先生从小养成了喜好读书的习惯,并且对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阶段,已经读了大量的古今小说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文学小丛书》中的中外文学名著,中华书局编《史记故事选译》、《左传故事选译》等“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多种,是当地有名的文章好手,曾在老师的指导下创办《海涛》诗刊,任主编,创作过了大量的新、旧体诗歌和散文。在高中阶段,他就读了《诗经选》、《唐诗三百首》、《李白诗选》、《屈原赋校注》、《古文观止》等书,也特别留意报纸杂志上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

上大学期间,他的兴趣逐渐转到古代文学方面,围绕所学科目,他阅读了《楚辞补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史记选》,选读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一些重要作家的文集与诗作,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并尝试研究《楚辞》方面的问题,撰写的相关论文受到老师的好评。“文革”开始后很多人忙于抓“牛鬼蛇神”、怀疑一切、搞大批判、

闹派性的时候，他避开人眼读了一些书。这为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7年甘肃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赵先生到武都一中任教。在“文革”的形势下，他认真地读了《鲁迅全集》，研读了《毛主席诗词》、《鲁迅旧诗》，读了一些当时不在批判范围之内的民间的东西，如《敦煌变文集》及中国戏剧史方面的著作，撰写了关于《公莫舞》研究的论文初稿。后来趁着“评法批儒”的运动，读了先秦诸子中包括《庄子集释》在内的不少书。看到唐晓文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撰《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人民革命的英雄——对有关跖起义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考证跖与孔子不同时，而与墨子大体生活在同一时代。在工具书极度缺乏，教材完全脱离学生实际的情况下编了《易错易混字》、《古汉语的虚词和句式》，油印发给全校学生，所撰《关于汉字教学的笔画问题》“文革”结束后刊于《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文革”中曾整理、翻译《天问》，为《天问正读》初稿。所写《〈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后刊于《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庄子·逍遥游》中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文革”十年的学术积累和思想砥砺，为他在之后解决一个个学术难题奠定了基础。

“文革”结束后不久，1979年，赵逵夫先生考为甘肃师范大学（即今西北师大）研究生，师从郭晋稀先生攻读先秦两汉文学。郭先生是著名学者杨树达弟子，在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以及古代文学史、古代文论等研究领域有极高建树。赵先生得遇名师，如鱼得水，读书面更宽广，钻研问题更深入，使他登堂入室，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当时的高校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很多大学生对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十分珍惜，因此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感染着每一个人。赵逵夫先生也不例外，在攻读硕士期间，他特别珍惜时间，除吃饭睡觉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三年里，从未看过电影、逛过街。把课



余时间全部用在研读专业书籍上，在楚辞学典籍方面用力尤多。正因为如此，在读书期间，他就发表了楚辞研究的论文《屈子赤角簠考》（《江汉考古》1982.1）、《〈天问〉义释八则》（《求索》1982.2）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赵先生幼年时常听父亲讲述古先贤的励志好学故事，其中乡先贤、汉末文人赵壹的刚直不阿和上禄长和海上学求书宽赦党锢文人的事迹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为古代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的人文情怀所打动，他在研究学问的同时，总是留意社会人生，十分关注国内外古典文学研究的动态。学位论文《屈原生平考辨》就是针对日本一些学者提出的新的“屈原否定论”而作的。这个选题的最初用意就为维护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了宏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多年以来他的很多研究都贯穿这一思路，体现高度的人文关怀。

归纳其来，赵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楚辞学研究。赵先生为楚辞学研究名家，以令人信服地考订屈原的家世、生平问题而饮誉学界。著名楚辞学史专家周建忠教授以“旧学根柢，新学气派”八字评价赵先生的楚辞研究，基本体现了赵先生楚辞研究方面的特点。1983年，其学位论文中的第二部分《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在大连召开的“屈原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楚辞学泰斗汤炳正教授评其“以熊渠长子伯庸为即《离骚》之‘伯庸’，发前人所未发，确为精辟之论。这个新的突破，为屈赋研究立了一功。”著名学者张震泽先生评其为“近中少见的文章”。该文收入大会论文集，后正式刊于《文史》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1985年）。1983年发表的《〈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多家刊物转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加以介绍。此后，发表的关于屈原与楚辞的研究论文有60余篇。其中学位论文之第一部分《〈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发微》（刊

《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尤为重要，该文以严密的论证，考定《楚策一》中所收同屈原生平相关的史料，指出其中“有人曰”以下大段文字为屈原写给淖滑（史籍中或作“昭滑”）的一封信。这是东汉王逸以来第一次发现有关屈原的史料和佚文，从而印证了《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充实了屈原生平的内容，也驳斥了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谓屈原事迹不见于先秦文献，因而否定屈原其人在历史上的存在的论调。以确凿的证据确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存在，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的疑惑，驳斥了一些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维护了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日本老一辈汉学家、国际著名楚辞学家竹治贞夫教授评其“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秘”。不少论文在国内和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学术刊物转载，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杨义《楚辞诗学》等著述均引述其研究成果。

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屈原与他的时代》，该书收入赵先生关于屈原生平及当时楚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研究的论文23篇（2002年10月增订再版，收文25篇），弄清了屈原生平中的重大问题，展现了屈原活动的背景和成长生活的环境。教育部社科司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一书中章培恒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学》部分在回顾“九五”期间的成就时特别论及此书，说：“经过从汉代以来的长期研究，古籍中关于屈原的史料搜罗殆尽，而作者通过细心的爬梳，仍能有所发现，因而显得难能可贵，也是学术领域的研究作风越来越深入、细致的体现。”教育部社科司编《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十五”规划》一文列举了“九五”期间的重要研究著作十余种，也列举了此书，并说：“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则以深入的发掘、细致的辨析，弄清了屈原生平中一些模糊或有争议的问题，并对屈原前后楚国文学作家的情况作了深入的考察。”



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部专著《屈骚探幽》(2003年由巴蜀书社再版)。该书分三编,上编《〈离骚〉的创作与艺术》,是从文艺学、美学、阐释学的角度对《离骚》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解决疑难,探究奥秘,揭示出两千多年来学者未能发现的艺术的光辉。头两篇原刊于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一篇论《离骚》的构思与龙马形象的意义,一篇论抒情主人公形象,俱言他人所未言。中编《〈离骚〉的继承与创造问题》,主要探讨屈原何以能登上世界文学的高峰,旨在揭示其创作的奥秘。下编《〈离骚〉正读》对《离骚》原文加以评点、新注,并对一些词语加以辩证。该书也引起学术界重视,中华书局《书品》等刊物有评介。

赵逵夫关于《九歌》、《天问》等也有一些极其富有创见的论文,如20世纪80年代刊在《北京社会科学》、《北方论丛》上关于《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的论文等。上海辞书出版社曾约请为《先秦诗鉴赏辞典》之领衔撰稿人(此书袖珍本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联合主编的《高等语文》特约撰写《〈离骚〉与骚体传统》部分。中华书局约其撰写《惊才风逸,壮彩云高》,作为《中华活叶文选》之一出版。

二、先秦文学研究与基础文本的整理。赵逵夫先生在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的研究和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整体上深化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关于上古神话、《周易》、《诗经》、先秦散文等方面,他均有精深的研究,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共计发表论文80余篇。这些论文多就先秦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论证,或解决疑难问题,或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引发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如《论先秦寓言的成就》详细论证了先秦寓言的形成、发展及相关理论问题,指出不仅先秦时寓言已成为独立的文体,而且战国末年已经有寓言专集。《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从文献材料和民俗材料两个路径出发探讨了《诗经》的成书过程,认为采集诗的工作是由双重身份的民间艺人完

成的；春秋以前也有献诗的制度，但不全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娱乐的需要；春秋中期以前的陈诗讽谏制度，在《诗经》成书之后演变为赋诗言志的习俗；《诗》的第一次结集是前七世纪中叶，由召穆公的子孙辑成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的部分；在鲁成公末年至鲁襄公前期，由郑国的贵族，主要是公孙舍之（子展）编定，孔子只是对编次和个别文字作了订正工作。而《叔孙豹的辞令、诗学活动与美学精神——兼论春秋时代行人在先秦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则从行人活动与文学创作、评论入手，揭示出先秦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也推出来一位应该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爱国作家与具有深刻思想的评论家。在此基础上，2003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古典文献论丛》。近年来，他又针对先秦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适时启动了几个先秦文学文本研究方面的大工程，旨在对先秦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真实可靠的基本文献。

赵逵夫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先秦文学编年史》共135万字，第一次对我国先秦时代从夏初至秦末的所有文学作品，包括各种韵文和有一定文学性的散文作品进行了全面清理，确定其真伪，并对时代及作者等进行了考订，对汉代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第一次对研究先秦文学、作家、文学活动的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比较，在通盘研究的情况下对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筛选出最佳答案。本项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用来考订作品的真伪、时代、作者，对前人之说既有辩驳，也有吸收，对于澄清事实，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学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该研究对历代出土的金文等文献，特别是近几十年出土的甲、金、简帛等先秦文献中与文学相关、相近的材料进行了详细考释，将它们按时代的顺序，同传世文献一起加以系年，显示它们在整个先秦文献中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同时充分展示了各个时代文学各种体式的发



展演变过程及其同其它艺术形式发展的关系，展示了先秦时代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同文学发展的关系，可以使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认识先秦文学的成就。这项创新性很强、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没有先秦文学编年史的空白。该成果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被收入代表国家社科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文库”。

赵逵夫先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学术创新的根本则在于学者的学识，当然也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些重大学术难题的突破性进展，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和恰当的时代氛围。清中叶以来，疑古思潮盛行，在疑古的眼光审视之下，先秦文学研究的基本典籍中几乎没有没问题的。新时期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迅猛进展，一批批甲、金、简帛“破土”而出，冲击着人们对先秦典籍的传统认识。学术界对以往视为伪书的前秦典籍有了新的认识，这给先秦文学研究的进展和突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赵逵夫先生十分关注考古、历史学界的学术动向，在经过多年的先秦文学的研究实践后，针对先秦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充分吸收了先秦史、考古学等方面的成果，适时地启动并完成了“全先秦诗”、“全先秦文”、“先秦文论全编要论”三个重要课题，使他的先秦文学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全先秦诗”在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卷》的基础上，穷尽性地搜罗先秦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的先秦诗歌，打破先秦诗歌现有格局，将《诗经》、《楚辞》、逸诗一并依照时间先后，考订年代、校理文本，汇为一编，使一编在手，即可明确先秦诗的全貌，知此前四千来年中诗歌发展演变之轨迹。

“先秦文论全编要论”旨在系统考释梳理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因其具有建设性意义，被列为“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出版。

“全先秦文”本为西北师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数年来已做

了大量工作。后来中华书局有关负责同志主动与他联系，扩展为《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作为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新编，约请国内一些重点院校在这方面有很深学养的专家学者分段承担，共同完成。全书篇幅将在原书（共 646 卷）二倍以上。该项目也被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列入“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这些课题的设计，主要是从先秦文学、文化研究的整体着眼，而其成果又都带有总结性、集成性的特点。2000 年 6 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曹道衡先生来兰州讲学，高度评价赵逵夫先生的先秦文学研究，称“先秦文学研究的中心在西北师范大学”。2003 年在兰州召开的首届“文学遗产论坛”大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也说：“西北师范大学是先秦文学研究的重镇”。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生前也特别称赞赵逵夫的先秦文学研究，亲笔为赵先生书斋书写“滋兰斋”匾额。2008 年夏，赵先生应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之邀赴台北讲学，作了关于《诗经》研究的学术报告，在台湾学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三、西北地方文献及民俗文化研究。赵逵夫教授还十分关注甘肃地方文化研究，自觉地将研究工作与地方文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实现学术与现实的对话和良性互动。通过多年的研究、考察，他指出：甘肃省境内除敦煌莫高窟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均集中在先秦时期。从河西走廊史前时期的黑山岩画，石器时代的大地湾遗址（秦安）、马家窑彩陶文化（广河）、齐家文化，到青铜时代的辛店、寺洼文化遗址（临洮），再到夏商时代的陇东地区先周文化遗址，还有天水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先王墓葬群及出土青铜器……甘肃省境内可以说是一个先秦文化的活态博物馆。同时，甘肃各地还有可与上述考古发现相印证的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如天水陇南的伏羲传说，形天神话与陇南的氏先民文化，“牛郎织女”传说与西和、礼县、天水、张川一



带乞巧风俗和陇东的农耕文化、牛文化，陇东地区的公刘传说，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俗活动等。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赵先生就立足甘肃拥有大量敦煌文书和相关研究资料的优势，对敦煌语言文学，尤其是敦煌俗赋、变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化》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我国唐代的一个俳優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中国文化》总第 2 期，1990 年秋由三联书店、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同时出版）、《李陵变文校补拾遗》（《甘肃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敦煌变文集〉第一卷六篇补校》（《兰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伍子胥变文〉校补拾遗》（《唐代文学研究》第 4 辑）等重要论文。

甘肃号称汉简之乡，赵先生在简帛研究方面，也有覃思精研的成果问世。《孙臆兵法校补》（《文史》第 39 辑、《简牍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原列〈孙臆兵法·下编〉十五篇校补》（《文史》第 44 辑，《简牍研究》（II），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年）、《从敦煌佚书与汉简看口传在古代文学传播中的作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 年第 2 期）等系列论文显示了赵先生在简帛研究方面的功力与利用简帛文献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独到眼光。

赵逵夫教授结合文献材料和甘肃境内的考古发现、远古遗迹的考察成果，对伏羲文化、陇南上古氏人与形天神话，周秦文化交融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等课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地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赵先生所发表的《八进位制孑遗与八卦的起源及演变》（《伏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韩国《东方汉文学》第十二辑，东方汉文学会 1996 年）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他的“西部与氏族源流研究”于 1990 年获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发表的《形天神话钩沉与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 年第 5、6 期）、《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氏族地望及

武都地名的由来》（《河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氏族渊源进行了细致地研究，揭示出了完全被湮没的历史事实，展示了中华民族早期形成中的一些文化现象。另外一组关于甘肃陇南西和县一带盛行的“七夕”风俗文化研究的论文发表后，直接促成西和县被全国政协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并使西和县乞巧民俗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先周文化与陇东文化研究方面，他的《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文化遗产》创刊号2007年）等文章，揭示了周民族在陇东地区的活动轨迹及对陇东文化的影响。文章发表后，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就连当地政府也请他去讲学，庆阳市也召开了首届“农耕文化节”。

四、宋前戏剧研究。赵逵夫先生从小喜爱戏剧，尤其喜好西北盛行的秦腔，可以背诵一些剧本。童年时曾与同一巷道里的同学、朋友自制木偶组织演出。这对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大学期间，李健吾先生来校讲学，受其启发，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剧作。由于这些原因，他在以上几个研究领域之外，还特别关注古代戏剧的研究。早在1967年大学毕业在武都一中任教期间，他就开始了对戏剧史的关注，他认真研读古代民间作品，撰写了关于《公莫舞》研究的论文初稿。之后虽忙于其他课题的研究，但对古代戏剧的研究状况、有关的考古发现等始终十分关注。他一贯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文杜绝空疏无物，非有见解不发，不解决学术问题不发。在有的领域如《周易》、《诗经》、《老子》、《红楼梦》等方面，虽只有几篇甚至一篇论文，但却能发前人所未发。他在戏剧史研究，尤其是宋前戏剧史研究方面的系列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持续的关注。特别是《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3期）等论文，在逯钦立、杨公骕二先生研